

索解文本：意识流文学作为话语发生装置

一个关于文学本体如何被发生的判断：难懂不是待解释的缺陷，而是一台持续索取论述的诱因机制

作者 秦莉 · SDE 学员 · 约 2.6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8日 · 加固版

摘要

意识流文学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它被尊奉为小说艺术从外部描写走向内心真实的进化论终点，却同时是普通读者阅读挫败率最高的文学流派之一。既有研究大多将这一“崇高”与“挫败”的并存视为一个需要被解释的矛盾。本文提出一个根本不同的判断：这一并存本身，就是意识流文学的本体运作方式。意识流文学的根本创造，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伦敦，而是一种新的文学物种——本文命名为“索解文本”。索解文本是一种其完整本体并非预先完成、而是在每一次阅读中通过系统地索取一个必需的解读行为来生成“作品”本身的文本。它的“难懂”不是等待被解释的缺陷，而是一个持续运作的诱因机制——通过制造认知层面的断裂，来索取、诱发并最终生成一部完整的、关于它自身的论述。意识流文学的崇高地位，不是“作品本身”与“阐释话语”的简单叠加，而是这项名为“意识流文学”的话语工程的共生性产物：文本生产论述，论述完成文本。本文在论证这一判断的同时，将其与伊瑟尔的“召唤结构”、布迪厄的“误识”、解构批评的“不可读性”等既有理论进行严格分离，并以马拉美诗歌作为关键对照，确立这一概念的边界。本文的目的不是否定意识流文学的伟大，而是为它的伟大提供一个更诚实的名字。

关键词：意识流文学；索解文本；文学本体论；阐释机制；文本-论述共生体

一、引论：一个被误诊的文学史事实

有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威望远远超过了它的可读性。意识流文学——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1925）与《到灯塔去》（1927）、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为核心文本——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占据了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它被摆在小说艺术进化链条的顶端，被尊奉为现代主义美学的最高成就。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世纪之交的历次“百年百部最佳英语小说”评选中几乎从不缺席三甲，“意识流”这个词本身已成为精英文学鉴赏力的一枚不言自明的勋章。

然而，与这种崇高形成尖锐对照的，是一个同样确凿却很少在同一场合被提及的事实：这些作品的普通读者阅读体验极差。大多数翻开《尤利西斯》的读者在几十页内放弃；大多数读完《达洛维夫人》的读者承认“知道它很好，但说不上来好在哪里”。这种挫败感不是“艰深”二字可以轻易打发的。许多艰深的哲学著作同样难读，但它们的难读来源于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推论的致密。而意识流文学的难读来源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读者不知道自己正在读的是什么。那些没有标点的、从一个女人凌晨躺在床上半梦半醒的意识中流淌出来的几十页句子——它们是什么？是故事？是描写？是哲学？读者无法将它们归入任何熟悉的阅读范畴。

这两个事实——崇高的地位，与普遍的挫败——并存了将近一个世纪。而文学研究对这一并存的主流处理方式，是将它视为一个需要用某一种解释来调和或裁决的矛盾。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调和方案支配了这一讨论。

第一种方案将“崇高”视为作品内在品质的自然结果。在这套叙事中，意识流文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确实写出了一种此前的文学从未做到过的东西——心灵在时间中真实运动的样子。这种品质是文本自带的、客观存在于字句之间的。至于“为什么那么多读者读不懂”——那是因为这种品质太高、太新、太不妥协，需要读者的感受力进化到足以接住它的程度。读不懂不是作品的缺陷，而是读者的感受力尚未抵达作品的证明。在这种解释中，“挫败”被“崇高”收编：挫败成为崇高的反证，成为作品深度的一个反向指标。

第二种方案——文学社会学与经典建构理论——从相反的方向切入。它不预设作品本身有什么内在的“伟大”，而是追问：一部大多数人读不下去的作品，它是怎么被放到那个位置上去的？答案落在制度、权力、学术再生产：大学课堂需要“难”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批评家需要“难”的作品来生产论文，出版商需要“经典”来维持长销书目。在这种解释中，“崇高”被“挫败”收编：崇高不是作品挣来的，而是制度运作出来的一种幻觉。

这两种方案在表面上针锋相对——一种站在作品这边说话，一种站在制度那边说话——但它们的底层逻辑共享着同一个未被审查的预设：意识流文学的“文本”和“阐释”是两个不同的实体。“文本”是先有的、完成的、躺在书页上的字句；“阐释”是后发的、附加的、围绕文本运转的话语。争论的焦点始终是：究竟是文本本身的品质在支撑其地位，还是阐释的话语在制造其地位？前者把褒扬归因于文本，后者把褒扬解释为建构，但双方都没有怀疑过“文本与阐释是两个东西”这条边界本身。

本文提出一个根本不同的判断：这条边界，恰恰是意识流文学所创造的那个新东西所取消掉的。意识流文学不是“文本很强，阐释在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其本体在结构中就包含了“索取阐释”这个动作的文本。它的“难懂”不是等待被解释的缺陷，而是一个持续运作的诱因机制——它通过制造认知层面的、无法被任何既有阅读习惯所接住的断裂，把读者逼入一个必须向外部索求“这到底是什么”“这好在哪”的解释的位置。它索取的东西——一篇论文、一堂课、一本导读手册、一段师生之间的问答——不是它的外部补充，而是它的本体的另一半。文本发出索取，论述回应索取，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识流文学作品”。

本文命名这种文学物种为“索解文本”。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非对一个文学史现象的权宜标签。它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意识流文学有什么特征”，而是“意识流文学作为一类文学对象，其本体是在什么条件下、经由何种机制、在何种关系中发生的”。这个本体论命题为我们重新理解意识流文学的经典化现象提供了工具，但并不等于该现象本身。它是本体的发生学，不是现象的形态学。

索解文本不是杰作的标签——不是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索解文本。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完全不需要阐释就能被任何识字的人读进去，并且从中获得真实的、深刻的感动。索解文本是一种特定的文学操作：它将自己的可读性——不是全部可读性，而是它的核心美学宣称所依赖的那部分可读性——建构为一个必须由外部论述来填充的空腔。没有那个空腔，它就不完整；没有那个填充，它的“伟大”就始终停留在“据说”层面，无法在阅读行为中被确实地经验到。

这个判断将迫使我们在理论层面回答一个严苛的问题：“索解文本”这个名字，到底有没有说出任何此前理论从未说出的东西？接受美学早已告诉我们文本中充满了“空白”等待读者填充；文学社会学早已告诉我们经典的地位是制度运作的结果；解构批评早已告诉我们意义永远在延宕、文本永远不可终读。如果“索解文本”不过是这些说法在意识流文学身上的一个新标签，那么它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命名。本文将在第三节专门处理这一问题，论证“索解文本”切开了一条此前未被辨识的辨别维度。在此处，仅需简要指出：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指认了一种在认知导航层面的“强制性空腔”——不是邀请读者参与审美想象的空白，而是系统性地拆除指称、时间、叙述者身份这些最基本的认知导航设施，迫使读者无法独立完成阅读行为本身，从而在结构上就必须向外索求解说的设计；以及一种双向咬合的“共生性本体”——论述不是作品的外部声誉，而是被文本的结构性索取所驱动、并且经过文本精密句法的筛选、最终被回写为阅读行为中不可剥离的“前见”的那一半。论述不是为文本服务，论述是文本完成自身的唯一方式。

二、推开默认的二元论

要抵达这个判断，必须先推开那个在既有争论中被双方默认的“作品-阐释”二元对立。因为这个二元对立太自然了，自然到它几乎从不被当作一个问题来提出。

在一般的文学经验中，文本和批评的区分是清晰的。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这是文本。一个评论家写了一篇评论——这是阐释。文本在先，阐释在后。文本可以不依赖任何阐释而独立存在——当最后一个读者消失，图书馆里的那本书仍然在那里，它仍然是同一个文本。阐释则不能脱离文本而独立存在——没有人会对着一篇没有对象的评论说“这是一篇好评论”。这种常识性的先后与依存关系，构成了文学研究全部操作的基础：分析的单元是“作品”，批评的功能是“揭示”或“照亮”作品中被遮蔽的某些维度。

意识流文学的研究传统忠实地沿用了这一基础。那些为意识流辩护的评论家——休·肯纳、理查德·艾尔曼、数不清的导读作者——他们的工作被理解为：乔伊斯和伍尔夫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他们写得太密集、太跳跃、太不照顾普通读者的习惯，所以需要有人把那部作品中被文字载体“隐藏”起来的匠心揭示出来，让普通读者也能看见。在这些评论家自己的理解中，他们做的事是对一部已经在那里、已经完成了的作品的服务。好的批评，是让作品自己说话；坏的批评，才是替作品说话。

经典建构论者——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1992）中的追随者、文学制度研究者——同样沿用了这一基础，只是把叙事翻转了过来。他们说：不，你们这些评论家不是在中性地为作品服务，你们是在用一套学术话语主动建构“伟大”的形象。大学、出版社、期刊匿名评审制度、百年百部评选的媒体机制——这套制度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乔伊斯是天才”的论述，然后用这些论述去规训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这个叙事中，“作品”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先于论述而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它是一个空的、可以被任意贴上标签的东西。论述是权力的运作，作品是权力运作的场地。文本和论述的关系，仍然是场地上与场地上的东西的关系。

双方都在“一个作品”与“关于这个作品的论述”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线。争论的只是这条线的哪一侧更重要、更真实、更配得上被认真对待。

但意识流文学的事实，恰恰让这条线画不出来。

让我们回到最朴素的阅读经验。一个读者翻开《尤利西斯》第三章。斯蒂芬在海滩上散步，他的思绪在亚里士多德的外感官理论、死去的母亲、爱尔兰的海草、自己破掉的靴子、莱辛的戏剧之间跳来跳去。读者读到的是一团没有标注来源的引文、自造的词语、被从中间截断的句子。他能感觉到“这里在写一个人在思考”，但他无法确定：这里哪一句是斯蒂芬在想的事，哪一句是被想起的某本书里的话，哪一句是作者乔伊斯自己的声音？他合上书，感到的不是“我读到了一部文学作品”，而是“我碰到了一面墙”。这不是一种挫折后仍然有所得的阅读。这是连阅读的门都还没找到。

现在，这位读者去读休·肯纳的《乔伊斯的声音》（1978）。肯纳告诉他：这一段不是在“乱写”——斯蒂芬的思绪看似散乱，实则被一个深层的对位结构组织着：他的每一次思绪的跳跃，都与他脚下的海滩的物理特性——可见事物的不可避免性——形成对照，而这一章的核心主题恰恰是“可见世界的不可回避性”，与前一章布卢姆在完全内在的感官世界中漂流形成对照。读者恍然大悟。他重新翻开那个段落，带着肯纳给他的钥匙，去辨认那些此前没有看见的结构。这一次，他看见了一些东西。

此刻发生的是什麼？如果我们坚持说“作品一直都在那里”——在读者第一次读不懂时它已经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必须承认，第一次阅读中，读者经验到的那个“作品”和肯纳所说的那个“作品”是同一个东西。但分明不是。第一次阅读中，读者经验到的是一堵墙。第二次阅读中，读者经验到的是一扇门。肯纳的论述没有“揭示”那堵墙上本来就有的门——肯纳的论述是在那堵墙上凿出了一扇门。或者更精确地说：肯纳的论述和斯蒂芬海滩散步那些句子一起，合起来构成了读者所经验到的那个完整的“作品”。在肯纳加入之前，那个段落不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它就是一项未完成的发生。它有一个结构性的空腔，等待着一个外部的解读来填充它。填充之前，它无法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被经验；填充之后，它才变成可以被经验到的那个“匠心”。

这就是索解文本与普通文本的根本差别。普通文本的阅读不需要外部论述来完成文本的自体——你可以完全不读任何关于《远大前程》的评论，皮普的故事已经完整地在那里了，你对它的感动是完整的。评论可以加深你的理解，但它不改变文本在阅读行为中的自体完整度。意识流文本则不然。那些散乱句子，在没有论述注入之前，并不构成一个可以被接住的文学对象。论述不是它们的补充，是它们的另一半。它们天生缺着一半。不是被作者不小心写缺的——是被作者以极高的自觉性设计成“必须靠论述来补全”的。

乔伊斯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他在《尤利西斯》出版后向朋友提供的那些著名的“解读指南”——斯图尔特·吉尔伯特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30）实际上是由乔伊斯本人逐章口授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一个小说家，在自己的小说出版之后，立即着手去生产一部关于它的解读手册。这不是一个作家在“帮助读者理解”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在完成他自己的作品——用论述。乔伊斯知道，没有吉尔伯特那本书在前面引路，大部分读者根本走不进《尤利西斯》的门。他不是在给一座已经建好的房子画一张游览地图，他是在给一栋还没有大门的房子安一扇门。而这扇门，就安装在论述之中。乔伊斯在1920年代致友人的一系列书信中反复强调，他在《尤利西斯》中“放进了足够多的谜语和迷宫，让教授们忙上几个世纪”。这句话通常被引为乔伊斯傲慢的证明，但它更准确的读法是：乔伊斯精确地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制造的不是一部可以被独立阅读的小说，而是一台将会持续索取论述、且其索取的论述数量和时长都已经被他的设计所预先估算过的装置。“让教授们忙上几个世纪”——这是一个设计参数，不是一个修辞。

伍尔夫在她的日记和讲稿——尤其是那篇著名的《现代小说》（1925）——中，持续地做着一件看似与小说创作平行的、实则与小说本体不可分割的事：她向读者解释“为什么小说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写”，她告诉读者“心灵真正接收印象的方式是一连串不断落下的微小原子”，她敦促读者放弃从情节和人物中寻找意义的旧习惯。这些不是她作为一个散文家的副业。这些是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工程的另一半：她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工作——在文本的方向上，制造那些使传统阅读习惯失效的句子；在论述的方向上，制造那些教导新阅读习惯的句子。两种句子，出自同一个人，为了同一件事。如果你只读她的小说而不读她的论述，你得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伍尔夫。不是你没有充分了解她——而是她没有打算让你只读小说就能接住她的小说。

三、划界：索解文本在哪些点上与既有理论分离

在展开机制分析之前，必须先直面一个直接关系到本文核心命名是否成立的质疑。“索解文本”这个概念，究竟有没有说出什么无法被现有理论兼容的新东西？一个熟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读者，很容易在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时产生这样的反应：这难道不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召唤结构”吗？伊瑟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论证过，文学文本的结构中充满了“空白”和“否定”，它们召唤读者去填充、去连接、去把文本的潜在意义实现为具体的审美经验。如果“索解文本”讲的无非是“文本有空白、需要读者来填”，那么它最多是“召唤结构”的一个案例重述，而不是一个新概念。

更有力的质疑来自文学社会学。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误识”概念，早已将文学经典的崇高地位解释为一套制度运作的产物：一部作品的伟大不是它内在品质的自然结果，而是批评家、出版社、大学、奖项机制共同建构出来的幻觉。参与者真诚地相信自己在鉴赏“纯粹的美”，却不知道这种鉴赏品味本身就是阶级习性的产物。经典建构论者可以轻易地将“索解文本”的论述收编进这个框架：所谓“文本索取论述、论述完成文本”的共生循环，不过是文学场为了再生产自身的合法性而运作出来的一种精致化的误识——批评家需要相信自己的工作是被文本所召唤的，否则他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在为了职业晋升而生产论文。

此外，还有一个本文必须主动迎上去的理论传统：解构批评。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1979）中对普鲁斯特的解读，以及希利斯·米勒关于文本“不可读性”的论述，已经系统性地论证了文学文本——特别是那些高度自我指涉的文本——如何必然地依赖阐释，并且这种阐释永远不会抵达一个终点。德曼在分析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那段关于阅读的著名段落时，展示了一个惊人的论证：文本本身的修辞结构，如何反过来解构了文本表面所宣称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解构批评同样主张“文本需要论述来完成自身”——或者更极端地说，文本永远无法完成自身，论述只不过是延宕这种不可能性。如果“索解文本”说的是同一件事，那么它充其量是解构理论在意识流文学身上的一个应用案例。

这三个质疑必须被正面回应，而非绕过。因为它们触及“索解文本”是否真正具有理论不可还原性的根本问题。以下分别处理。

先分离“召唤结构”。伊瑟尔在《阅读行为》（1978）中论证，文学文本不同于说明性文本，它的图式化结构天然地含有许多“未定点”——那些没有被作者明确写出的连接、因果、动机、后果。这些空白不是文本的缺陷，恰恰相反，它们是文学审美的发生装置：读者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将文

本的图式转化为自己脑海中的审美客体。一部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它的空白组织得足够好，能够有效地引导读者的想象力去完成这一转化，而又不给想象力完全自由发挥以致脱离文本控制的空间。

索解文本的空腔在功能上与伊瑟尔的空白有一个根本的分离。伊瑟尔的空白是一个邀请：读者被邀请进入文本的想象空间，在文本的引导下完成审美体验。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读者，凭借敏感与耐心，完全可能在第一次阅读《达洛维夫人》时，被伍尔芙的句子带入某种他此前未曾经验过的意识流动的感觉，尽管他说不清楚这种感觉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就是伊瑟尔的空白在工作：它让审美体验直接发生在读者与文本之间那个沉默的互动中。

索解文本的空腔则是一个强制。它不是邀请读者在想象中完成文本，而是逼迫读者在认知崩塌后向外求救。区别不在空腔的大小，而在空腔所在的层面。伊瑟尔的空白在审美-想象层面运作：即便文本的句法、指称、时间序列完全清晰——你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人物在回忆”——文本仍然可以留下大量的意义空白让你去填充（“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起这个？”“这个意象暗示了什么？”）。索解文本的空腔则在认知-导航层面运作：它通过拆毁指称标签、取消时间切口的过渡信号、悬置叙述者的身份信息，让你在连“这是谁在什么时候想什么”这个最基础的认知事实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完全失去了进入文本的能力。你不是没有审美体验；你是连阅读本身都无法进行下去。

这个功能层面的分离导致了一个实质后果：在伊瑟尔的框架中，论述（批评家的解读）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辅助工具。它能加速、深化读者的审美体验，但不会改变体验的本体性质。但在索解文本的框架中，论述改变的是文本在阅读行为中能否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对象被经验到。在没有外部论述注入之前，那个文本在读者的经验中不是一部“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杰作”——它是一个不完整的、无法作为文学对象被经验到的半成品。肯纳的论述不是“加深”了读者的体验；它是让读者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可以被“叫做体验”的东西。在肯纳之前，那个读者对斯蒂芬海滩段落的经验，更准确的名字是“困惑”，不是“不完整的审美体验”——困惑与体验是两类不同的心理事件。这就是“强制性认知空腔”与“审美召唤空白”之间的辨别线。

再分离“误识”。布迪厄对文学经典的祛魅分析，建立在一个他所谓的“历史化”操作之上：追问那些被我们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超历史的审美价值，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制度运作中被生产出来的。纯粹的美学凝视——那种声称只关注作品的形式、风格、语言而悬置一切社会功利的凝视——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本身就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历史产物，它与特定的阶级习性和教育制度的再生产紧密挂钩。应用到意识流文学上，布迪厄式的分析会指出：乔伊斯的崇高地位，不是他句法精密的自然回报，而是文学场内部的行动者——那些拥有最多符号资本的先锋派作家、那些掌握经典化权力的大学教授、那些需要通过出版“难懂”作品来标榜自己品味等级的出版商——共同建构出来的结果。

索解文本的判断与布迪厄式分析在一个关键节点上分道扬镳。在布迪厄的框架中，作品本身的内容——它的句法、它的叙事结构、它的美学特质——在经典建构的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被动的、甚至几乎可以被忽略的角色。因为作品的“伟大”本身就是场域斗争的产物，不是其原因。这个逻辑推至极端，会得出一个暗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制度机器，任何一部随机抽取的文本都可以被建构为文学经典，只要所有拥有足够符号资本的行动者一致宣称它是天才之作。

索解文本的判断恰恰在这个点上拒绝了布迪厄。它指出，一部能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地索取到越来越高精密的论述的文本，不能是任何一部随机文本。它的空腔必须是“硬”的——被高度精密的、有自觉意图的句法所包围、所定型——否则它无法持续地发散出“你再看仔细一点，你一定漏

掉了什么”的磁场。一篇完全没有精密性可言的混乱文本，一旦被最初的几位学者仔细检查之后，它的混乱就会被识破，论述的生产就会停止。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抵抗了这种蒸发将近一个世纪。它的抵抗不是因为“它被保护的制度太好”。它的抵抗是因为它的句法本身具备一种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任意书写”的秩序密度。肯纳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乔伊斯的每一种风格转换、每一个看似古怪的用词、每一次对位结构的安排，都遵循着一种可以被反复检验和印证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不是肯纳凭空捏造的——它是乔伊斯花了十七年一笔一笔写进去的，是可以被一代又一代学者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去重新发现的，而又每一次重新发现都会带回新的证据。这个事实不能被布迪厄的框架所消化。布迪厄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一部作品是精密的，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部作品可以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方法论的攻击性细读下，每一次都能被证明确实是精密的。误识可以解释信仰的继续，但无法解释信仰在每一步验证中都能得到文本证据的支持。

这就是索解文本与建构论之间的核心辨别线：索解文本不否认制度运作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但它坚持，能够启动并继续长达一个世纪的论述共生循环的文本，必须具备一种文本内部的“硬空腔”结构——那是一种由精密的、可以被反复印证的句法秩序主动建构出来的、“看进去之后确实会不断发现有东西”的文本特性。它不是“因为被说成伟大，所以伟大”；它是“因为设计了那种能够被一说再说的结构，所以才伟大”。

最后分离“解构性文本”。德曼对普鲁斯特的著名解读，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文本表面宣称的意义（“阅读是通往真理的入口”），被文本自身的修辞结构（那段关于阅读的文字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编织物，而隐喻的本质是任意替换）所暗中瓦解。文本在“说”一件事，但它的“说”的方式却让那件事无法成立。在这个意义上，解构批评确实主张文本依赖阐释，并且阐释永远无法终结——因为文本的修辞结构会持续地产生新的自我拆解的可能性。

但请注意德曼论证的核心动力来自哪里。它来自文本修辞结构内部的一种自我对立——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语法与修辞的冲突、字面义与比喻义之间的互相颠覆。这种自我对立是文本内部的、结构性的，它在每一次仔细阅读中都会被重新激活，无论读者是否借助外部论述。一个有经验的解构阅读者，可以独立地在文本中辨认出修辞结构的自我拆解运动，而不需要德曼坐在他身边。阐释在这里——和马拉美的情况相似——是可以被内化的工具。一旦学会了辨认修辞结构的自我冲突的方法，读者就可以独立地在其他文本中重复这种操作。

索解文本的空腔则不在修辞的自我冲突这个层面上。它不在“这句话表面上在说X，但它的修辞结构暗中在说非X”这个维度上。它在更基础的层面：读者根本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在什么时间说的、是对什么事件的反应。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第三章制造的不是修辞的多义性，而是认知坐标的缺失。德曼分析普鲁斯特的那段文字时，读者至少清楚地知道“这是叙述者马塞尔在回忆他童年时的阅读场景”。他有这个地面。肯纳能在这个地面上展示普鲁斯特的修辞如何自我拆解。但乔伊斯的读者连这个地面都没有。他不是在“误解”文本——他是根本没有进入文本的通道。

这就是索解文本与解构性文本的辨别线：解构性文本的“不可终读”发生在修辞-意义层面——文本内部的修辞结构会持续产生新的自我拆解的可能，因此阐释永远不会穷尽文本；索解文本的“不可进入”发生在认知-导航层面——文本拆除的不是意义的确定性，而是阅读行为本身所依赖的基本认知坐标。一位读者可以在不被任何外部论述辅助的情况下，独立地对《追忆似水年华》进行解构阅读

——他的阅读可能不够精到，但他确实在“阅读”这部作品。同一位读者面对《尤利西斯》第三章，他根本无法开始“阅读”——他需要肯纳先告诉他“这一段是在写什么”，然后他的阅读才能开始。解构批评处理的是“阅读之后发现意义不稳定”；索解文本处理的是“阅读之前就没有进入文本的入口”。这不是程度的差异，是层面的差异。

完成了上述四项理论分离之后，“索解文本”这个概念究竟贡献了什么，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总结。它贡献的不是“文本有空白需要读者参与”这个一般命题——那是伊瑟尔的贡献。它贡献的不是“经典地位被制度建构”这个批判性视角——那是布迪厄的贡献。它贡献的不是“意义永远在延宕、文本具有自我解构性”这个洞见——那是解构批评的贡献。它贡献的是对一种此前未被单独命名的文学物种的指认：一种其本体不在纸页上、不在读者的个体审美体验中——这两者中的任一者单独存在都无法构成它的完整本体——而只在文本的硬空腔与论述的持续填充这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生的文学物种。它的关键词不是“空白”，是“强制性向外的索取”；不是“制度的建构”，是“精密结构对论述的筛选与再生产”；不是“修辞的自我解构”，是“认知导航的系统性拆除”。这三条辨别线合在一起，才构成“索解文本”不可被已有概念还原的理论收益。

四、索解机制一：以“索取”为功能的文本结构

划清了理论边界之后，必须进入文本的肌理层面，去看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究竟在句子里面做了什么，让那些句子成为一种结构性的、而非偶发性的“必须向外索求解说”。

意识流文本对读者的逐出，不是发生在宏观的谋篇布局层面——不是因为它“没有情节”。许多没有情节的散文和诗也很容易被接受。逐出发生在最细微的语法、指称与连接的层面——那些被传统叙事文本当作地基来用的、读者从来不需要有意识地去识别的认知路径，被系统性地拆掉了。

第一个例证来自《尤利西斯》第三章斯蒂芬海滩漫步的段落。一个叙事文本要为读者建立基本的认知导航，至少需要回答三个无声的问题：此刻是谁的意识在流动？此刻这个意识里流转的材料是什么——是感知、记忆、引文还是幻想？这些材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大多数小说中——包括那些以心理描写见长的十九世纪小说——这些问题是由一个全知叙述者来回答的。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坐在火车上回想她与渥伦斯基的初次相遇，全知叙述者会先锚定主体（“安娜想着”），然后锚定回忆的内容，再用清晰的过渡（“她记起那一天……”）将回忆与当下区分开。读者不需要主动去判断这些——一切路径都标好了。

乔伊斯取消了标注。在斯蒂芬的海滩段落中，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中的希腊文短语、某本不知名德语书中的拉丁文句子、斯蒂芬自己对母亲的回忆、对身边狗的观察、对自己破靴子的念头——这些来自完全不同来源的材料，被不加引号、不加出处标签地并置在连续的句子中。没有任何过渡告诉你“此刻他不再想亚里士多德，他开始回忆他的母亲”。也没有任何标记区分“这是斯蒂芬自己的念头”与“这是斯蒂芬正在想起的某本读过的书里的话”。读者面对的是一段在语法上连续、但在指称上被炸成了无数碎片的文本流。他知道这些碎片应该有某种秩序——否则乔伊斯不会花十七年把它们写下来——但他找不到那个秩序。他被单独留在碎片中间，没有任何导航。

第二个例证来自《达洛维夫人》的时间跳跃。伍尔夫取消了“回忆”的叙述学框架。在传统叙事中，一个人物回忆过去，叙述会有一句明确的过渡——“她回想起二十年前在伯顿庄园度过的那个夏

天”。读者清楚地知道：外面的大本钟在敲十二点，而这段话内部的时间，是二十年前。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做的事，是把这个“她回想起”的框架删掉。克拉丽莎在邦德街的花店里闻到的花香，与二十年前伯顿庄园清晨的花香，不是通过“她回想起”的通道被连接起来的，而是直接并置在同一段句子里——当下与过去无缝地叠在一起。读者在读到的那个瞬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从“现在”进入了“过去”，因为他没有接收到任何关于时间切换的信号。当在这段话的中途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移位时，他已经追不回去那个切口了——他无法说出花店的气味是在哪一个词上滑进伯顿庄园的。

这个操作不是随便写的。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明确表达了她的意图：心灵不是按照“先感知、后回忆、再联想”的次序运作的，它是在同一瞬间接收无数印象——过去的和现在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并将它们熔为一炉。一个忠实地呈现意识真实运动的文本，就应当真实地呈现这种“没有切口”的跳跃。伍尔夫在她1920年代的日记中也反复写到，她在尝试一种“新的小说形式”，这种形式将“不会有叙述者的支架”，读者将“被直接扔进意识的流动中”。她在写作《达洛维夫人》期间的日记记录了她对这种形式的自觉探索：“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思考如何把过去织进现在，不让读者感觉到那道缝合线。”这个记录清楚地表明：“不让读者感觉到缝合线”不是一个疏忽——它是她有意识地追求的效果。她要用没有缝合线的叙事，逼使读者经验到与克拉丽莎同样的一种时间感受：过去的不是“过去”的，过去的就活在现在之中，它们之间没有边界。而读者如果要理解这种感受——不是被它淹没，而是理解它——他就需要一个外部的支架：伍尔夫自己的论述。

第三个例证来自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第一章“班吉的部分”。这一章对读者的逐出比乔伊斯和伍尔夫更为极端，因为它拆掉了时间线本身的可追溯性。班吉是一个智力残障者，他的意识在“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切换没有边界——当下闻到的一棵树的气味，触发了他对几十年前姐姐凯蒂身上的同样的树的香味的记忆。这两个时间被完全无痕地并置，唯一的切换信号是字体的稍稍变化，而大多数版本的排版中这个变化极其细微，甚至完全被忽略了。读者翻开第一页就被抛进一个意识之中——他完全不知道讲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个三十三岁的智力残障者，他不知道这个人的此刻是在哪一年，他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是在哪个房间里，他不知道自己读到的这些没有联系的碎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他唯一知道的是：他读不懂。不是“有点难”，而是“完全不知道正在读的是什么”。

这三个例证指向一个共同的操作：在这些文本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为什么说到这个——不是被叙述者预先组织好再完整交付给读者的，而是被刻意地压碎了。读者接到的不是一份思想的记录，而是一地思想的碎片。他要自己脑子里把这些碎片重新组织起来，但他没有任何组织所必需的线索。他不是在被邀请去完成一个可以完成的拼图——他是在被锁在一个没有钥匙的房间里。

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看见索解文本与伊瑟尔“召唤结构”在文本操作层面的实质分界线。伊瑟尔的空白不管有多大，它预设了一块能够被读者踩稳的地面——最基本的叙事认知导航。读者至少要知道“这是一个叫斯蒂芬的男人在海滩上想事情”，才能真正开始填补伊瑟尔式的空白——比如，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死去的母亲？这个回忆与刚才那段希腊引文之间有什么隐藏的联系？这些是伊瑟尔意义上的“意义空白”，是审美活动的入口。但如果读者连“这是一个叫斯蒂芬的男人在海滩上想事情”这个最基础的认知坐标都无法确定——因为他没法分清哪句是斯蒂芬的念头、哪句是被他想起的引文——那么他就根本没有进入伊瑟尔式空白的资格。他还站在文本的外面。肯纳的论述，不是

帮他填补了伊瑟尔式的意义空白，而是帮他找到了那扇可以让自己第一次进入文本的门。门都没有，何谈门内的东西？

因此，“索取”不是一个比喻。意识流文本在三种具体的语法与叙事操作中，将自己的认知可进入性建构为了一个空腔：撤掉指称标签，让读者不知道“谁在想什么”；取消时间切口的过渡信号，让读者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悬置叙述者的身份，让读者不知道“是谁在讲这个故事”。这三个空腔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让未经训练的读者陷入彻底的迷失。而迷失的位置，恰恰就是向外索求解说的位置——不是因为读者恰好好奇心强想要了解更多，而是因为文本本身的结构里，就没有给读者自己走出迷失留够信息。它是故意的。它故意把你留在一个无法独自站立的地方，因为你一旦被逼进了那个地方，你就不得不向外伸出手——去翻开那本导读，去搜索那篇书评，去听那堂课。而当你的手伸出去的那一刻，索解文本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五、索解机制二：论述回写文本——一项被忽略的机制与它的运作证据

文本制造索取的空腔，这是整个结构的一半。另一半是：索取出去之后，论述如何反过来改变文本在后续阅读中所呈现的本体样貌？“论述改变文本的本体”这个断言，是全文最容易被质疑为“文学化修辞”的地方。本节必须在机制层面把它坐实。

让我们回到肯纳。肯纳的《乔伊斯的声音》（1978）在乔伊斯研究史上被广泛视为一次决定性的“揭示”。但本文要论证的是，“揭示”这个描述掩盖了真正发生的事情。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肯纳把一种此前未存在于任何读者经验中的秩序，写进了《尤利西斯》的阅读史，以至于此后的读者无法再在肯纳之前的状态中阅读那个文本。这不是比喻——它有一个可以被精确描述的心理机制：前见植入。

二十世纪哲学阐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的论证——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所有的理解都是在“前见”中发生的。我们每一次面对一个文本，都不是一张白纸；我们携带着此前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关于这个文本的信息、关于这类文本的阅读惯例、关于“什么是好的文学”的判断标准——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前见，而理解就发生在前见与文本之间的那个互动事件中。伽达默尔的要点在于：这不是理解的缺陷，而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没有前见，你根本无法开始理解——你面对白纸黑字，连“这些符号是文字”这个最基本的判断都无法做出。

索解文本将这一普遍的解释学事实，推到了极端并使其成为文本设计的一部分。意识流文本的空腔结构，使得读者在面对它时，自身的“自然前见”——那些来自阅读传统叙事的经验——完全失效了。他无法用“这是一个人在回忆”这个前见去套《尤利西斯》第三章，因为文本没有给他足够的信息去确定“这是一段回忆”。他的自然前见全面崩溃，留下了一个前见的真空。而肯纳的论述，恰好在那个真空中植入了一个新的前见——“这一章有一个‘可见世界之不可回避性’的对位结构”。在读者读到肯纳之前，这个前见不在他的头脑里；在读者读到肯纳之后，这个前见被植入了。此后的每一次阅读，他都是带着这个前见去面对文本的。而这个前见改变了一切：那些此前看起来散乱的碎片，现在在前见的光照下，显现出了一种秩序。碎片没有变，但碎片之间的关系变了——因为读者的前见把碎片组织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模式。

这就是“论述回写文本本体”的操作机制：论述通过植入前见，改变了读者后续每一次阅读的认知起点，从而改变了文本在阅读行为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文学对象的样子。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它不是在肯纳之后就停止了。实际上，任何一部重要的乔伊斯论著，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它植入一种新的前见，这种前见改写了后续读者的阅读体验，而后续读者中那些最敏锐的人，又会在被改写后的体验中，发现前一轮前见所无法覆盖的新的细节——然后他们写下新的论述，植入新一轮前见。这就是共生循环在时间中展开的具体形态：每一代乔伊斯研究者，都是在前一代论述植入的前见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带着这些前见去重新面对文本，然后在文本的硬壁上发现——或者说，被硬壁激发出——新的细节；他们把这些细节写进新的论述，为下一代读者植入了更深一层的前见。

这个机制不是理论推演。它在乔伊斯接受史中有清晰的、可被指认的痕迹。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案例。

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乔伊斯研究的主流前见来自艾尔曼的传记式批评和他的前辈们：把《尤利西斯》读作一部“用神话结构组织的现代奥德赛”。这个前见——每一章对应《奥德赛》的一章——为早期的乔伊斯读者提供了第一张导航地图。带着这张地图，读者在斯蒂芬的海滩独白中辨认出了忒勒马科斯的身影，在布卢姆的漫游中认出了奥德赛的旅程。这个前见把碎片组织成了一个可辨识的模式。

然后在1970年代，肯纳——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后结构主义倾向的批评家——在前一代前见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些那个前见无法覆盖的新细节。最核心的一个发现是：乔伊斯的每一个章节不仅有不同的叙述内容，还有不同的叙述声音——不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口吻在讲故事”，而是“叙述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被每一种风格所探究”。肯纳把这个发现写进《乔伊斯的声音》，为下一代读者植入了一个新的前见。带着这个前见，读者不再只是在《尤利西斯》中辨认一个现代奥德赛——他们开始在每一章的风格转换中，辨认一种对“什么是叙述”的系统性探究。

然后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那些重读《尤利西斯》最后一章“莫莉的独白”的学者——带着肯纳植入的“叙述声音”前见，发现了一个肯纳自己的前见所未能照亮的新维度：莫莉的独白不仅是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它更是一种被压抑的女性声音的爆发，是对前十七章男性叙述支配的颠覆。这个发现被写成新的论述，植入下一轮阅读。

这个接受史序列的核心要点在于：每一个新发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前一轮论述植入的前见所开辟的视野中，才变得可见的。艾尔曼之前，“神话结构”这个前见不在任何读者的头脑里；这个前见被植入之后，读者才开始在文本中“看见”神话对应。肯纳之前，“叙述声音”这个前见不在；这个前见被植入之后，读者才开始“听见”每一章不同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之前，“莫莉作为被压抑的女性声音”这个前见不在；这个前见被植入之后，读者才在莫莉的独白中读出了性别政治的维度。每一轮新论述，都不是在“揭示一个一直都在那里的东西”——它是在植入一种新的前见，而这种新的前见使得此前不可见的秩序变得可见。

这就是为什么“论述构成本体另一半”不是一个修辞。它是伽达默尔“前见”概念在意识流文学这个特例中的极端化运作。在所有文学阅读中，前见都参与构成理解。但在普通文本中，读者的自然前见——那些来自一般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的预期——已经足以让文本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对象被经验到。你不需要读过任何一篇关于《远大前程》的论文，也能被皮普的故事打动。论述可以深化你的前见，但它不构成前见的必要条件。索解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系统性地使读者的自然前见失效，

并且它把文本的“硬壁”设计成了能够持续地与植入的新前见发生反应——新前见照出新的细节，新细节催生更新的前见。论述在这里不是前见的奢侈品——它是前见的唯一来源。没有论述植入前见，读者面对文本就是面对一堵没有任何门的墙。因此，论述就是文本的门。门不是墙的装饰——门是墙得以被穿越的唯一方式。没有门，墙就是终点；有门，墙才是入口。

这个机制还解释了第五部分开头提出的另一个质疑：为什么乔伊斯的“精密句法”必然导致论述的持续再生产，而一篇同样极尽精密的数学证明却可能在穷尽阐释后变得“安静”？答案在于：乔伊斯的精密句法所组织起来的，不是一条透明指向唯一答案的逻辑链，而是一种被精密地设计过的多义性。那个空腔不是混沌的——混沌的东西一旦被看穿，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个空腔是精密的——它的形状足够明确，因此可以对论述形成筛选（不是任何随意的解读都能在硬壁上弹回火花）；同时，它的意味又足够多向，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前见能够穷尽它所有的可读层面。数学证明的精密度指向唯一解；索解文本的精密度指向不断增殖的解读。前者的终点是“证明完成”；后者的终点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每一轮新前见都会在硬壁上找到那个前见所无法覆盖的新的面。

正是在这个点上，索解文本的“共生”概念最终结束了与布迪厄“误识”的纠缠。布迪厄可以解释为什么学者们会“想要”相信乔伊斯藏着东西——他们的职业合法性绑在这个信仰上。但布迪厄无法解释乔伊斯接受史中的这个具体事实：每一代学者，带着上一代植入的前见去重新细读文本时，确实都发现了上一代的前见所不能覆盖的、新的、可以被独立验证的文本细节。这个事实不能仅仅被还原为“他们需要相信有新东西，所以幻觉了它”。因为如果是幻觉，它应该在跨代际的、跨学派的、带有不同理论前见的学者们的反复检验下被戳破。但它没有被戳破——它反而在被不同学派、带着不同理论工具去检验时，每一轮都回馈了新的、可以从文本中具体指认出来的证据。误识生产信仰，但误识无法生产这种程度的、跨世代的、被反复独立验证的经验一致性。唯有文本本身具备那种硬空腔结构——持续地向不同理论前见开放不同的面——才能解释这种一致性的来源。

六、为何不是马拉美：一个关键的对照案例

至此，本文已经论证了“什么是索解文本”，以及它如何在《尤利西斯》等作品中运转。但仅凭正面论证和理论分离，还不足以确立这个概念的严格性。一个强有力的检验来自反面：我们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某些同样以“难懂”著称、同样在学院中被大量研究的先锋派文学，并不是索解文本。如果这个概念不能做出这种排除，它就可能过于宽泛以致失去辨别力。

马拉美的诗歌是最好的试金石。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几乎没有比马拉美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1897）更晦涩、更需要被不断解释的作品了。它同样索取阐释，同样在学院中拥有一批忠诚的研究者。然而，意识流文学催生了一个宛如工业般庞大的学术生态——单是研究《尤利西斯》的专著就可以塞满整列书架，乔伊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年年召开、场场满座。而马拉美研究虽然精深且高质量，却从未达到过这种体量和再生产能力。为什么？如果用“经典地位是制度运作的产物”来解释，我们很难说马拉美的制度支持比乔伊斯弱：他同样被供奉在法国文学的最高殿堂，同样被一代代理论大师——从布朗肖到德里达——反复征引。如果纯粹用“文本内在品质”来解释，我们也很难说马拉美的诗歌比乔伊斯的小说“客观上更简单”或“艺术价值更低”——在某种评判标准下，马拉美的纯诗甚至比乔伊斯的小说更接近现代主义美学理想的顶峰。

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变量是什么？

答案在于两者制造的“难懂”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文本层面。马拉美的晦涩来自他所创造的一种极端的语义浓缩——每一个词都被从日常用法中剥离出来，被赋予多重同时生效的暗示，而语法本身被折叠成一种迫使读者不断在几个可能句法方向之间来回摆荡的迷宫。用最简单的话说，马拉美诗歌的难，在于“每一个词我好像都认识，但连起来之后我不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但请注意：读者在马拉美诗歌中，并不缺失认知导航。他知道此刻是“一个诗人在言说”，他知道他读到的这些句子“是诗”，他知道那些词在正常的法语词典中的含义。他的迷失发生在语义层——他不知道这首诗“意味着”什么。这种迷失，需要被解释，也可以被解释。而一旦这种解释被一个读者内化——一旦他学会了如何在马拉美的句法迷宫中辨认出几种可能的语义路径——他就不再需要那个解释者了。一个被训练过的读者，可以学会独立地阅读马拉美，用自己的敏感去反复品味诗句的多义性。阐释在这里，是一个可以被内化的工具。它最终会把读者送回文本内部。

意识流文学制造的难懂，则发生在认知导航层。读者面对《尤利西斯》第三章的迷失，不是“我不知道乔伊斯在表达什么深刻的意义”，而是更基本的——“我不知道现在是谁在说话、他说的话是他自己的念头还是他正在回忆起的一本书里的话”。这不是语义晦涩，这是指称断裂。这种迷失，无法通过“点明连接”来一次性修复，因为文本本身就没有给出可以让读者自己以后独立辨识连接的足够信息。每当一个新读者打开《尤利西斯》第三章，那个空腔就在那里，毫发无损——乔伊斯的句法不会因为上一代读者已经被肯纳教会了而发生任何改变，它仍然严格地、绝不含糊地不提供任何导航信息。因此，每一个新的读者，都必须重新经历一次认知崩塌，然后重新被指向那个外部的解读。阐释在这里，不是一个可以被内化的工具——因为被内化的不是“阅读这个文本的能力”，而是“记住肯纳的论述的能力”。你无法“学会独立读《尤利西斯》”而不再需要那扇门——你只是把门的钥匙从书架上的导读，移到了你自己的记忆里。但那个钥匙本身，仍然是肯纳造的那一把，不是文本自带的。

这个对照澄清了索解文本概念的一个核心边界。要成为索解文本，一个文本的难懂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难懂发生在认知导航层面，而非单纯的语义歧义或概念复杂度层面——读者的初始反应不是“我不懂它的深意”，而是“我不知道我正在读的是什么”。其二，这种认知导航的缺失必须是文本内部的一种结构性的、不可被单个读者通过提高自身阅读能力而一劳永逸地绕过的设计——它不是“太新了还不习惯”，而是“不给你习惯的地面”；每一代新读者都必须重新被外部的论述接住。其三，这种缺失在历时层面上，必须能够持续地诱发论述——也就是说，它的“空腔的壁”必须足够硬（由精密的、有自觉意图的句法所建构），以至于学者们每一次去“看仔细”的时候，确实都能发现可以被独立验证的新细节，而这些新细节的积累又不会“填平”那个空腔本身，因为无论多少细节被解释，认知导航本身仍然没有回到文本的内部。

马拉美满足了第三条（他的诗有足够精密的句法持续诱发高质量论述），但只部分地满足了第一条（他的难更多是语义层面的，读者知道自己是在读诗，但不知道诗在说什么），而完全不满足第二条——一个有经验的马拉美读者，确实可以在大量阅读和训练之后，独立地、无需外部论述地，从《骰子一掷》中获得一种深切的审美体验。他不是“在背诵解读”；他是真的学会了读马拉美的那种特殊的语法。这就是文学训练的正常功能：它把读者送到了足以独立站立的地方。而乔伊斯训练，在核心章节上，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读者送到那个地方。它只把读者送到“知道哪本导读里有一把钥匙”的地方。

这个对照还说明，“索解文本”不是对文学史中所有“难懂”作品的泛泛重命名。它是一个窄概念，专指那种在认知导航层面制造了不可被内化的结构断裂、因此必须终生依赖外部论述来完成其本体的文本物种。象征主义诗歌总体而言不是索解文本——不是因为它不够难，而是因为它没有拆掉“这是一首诗”这扇最基本的认知大门。许多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也同样不是——因为它们制造的断裂往往是一次性的噱头，无法像乔伊斯的句法那样在一个世纪的细读下仍然持续地“像”是藏着还未被穷尽的东西。索解文本需要那个硬空腔——需要乔伊斯式的十七年锻造。这不是每一部难懂的作品都能满足的条件。

作为这个对照的延伸，我们还可以简要考察另一个相邻案例：意识流电影。为什么《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或《野草莓》从未催生出像乔伊斯研究那样庞大的学术工业？答案落在电影媒介的本体特性上。电影是一个“呈现”系统，而非“陈述”系统：当伯格曼在《野草莓》中拍出一口没有指针的钟，影像已经直接完成了那个意象——观众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这表达时间停滞”，他在看见的那个零点几秒内就已经理解了。电影影像的直接完成性，消解了索解文本成立所必需的那个结构性空腔。这个跨界对照，从反面加固了索解文本概念的边界：它要求一种只有语言这种线性符号系统才能制造的、在认知导航层的结构性缺失。视觉媒介的直接呈现性，使得这种缺失不可能被建构出来。

七、为什么是它：意识流文学作为索解文本典型的形成条件

如果索解文本这个概念是成立的，那么一个逆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以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而不是其他同样“难懂”的文学流派，成为了索解文本最成功的案例？上一节已经论证了为什么马拉美不是索解文本，这一节要回答的问题是：意识流文学究竟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同时满足了“制造空腔”的文本条件和“索取到的论述足够庞大”的回应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哲学赋魅与认识论转向的历史耦合。意识流文学诞生于一个哲学已经被知识阶层广泛接受的时刻。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中命名了“意识流”，亨利·柏格森在1910年出版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提出了“绵延”——这些概念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间，经由大学课堂、知识分子沙龙、文学杂志的层层传播，已经在作家群体中成为某种共识性的知识背景：不是哪一部著作的晦涩命题，而是一种空气中的常识——“心灵是流动的”“真正的时间不是钟表时间”。这一背景为意识流文学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初始赋魅：它让意识流文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不被视为一种“风格实验”，而被视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必需”。一个作家如果不写意识流——不呈现意识的非线性、记忆的突然闯入、时间的层叠——他就是在用一种已经被哲学证伪的工具去处理真实的心灵。这个判断在认识论层面封堵了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批评——“这写得太乱了，不像真的”。因为哲学在先说，“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封堵为索解文本的运转提供了第一个齿轮：它把“认知导航崩塌”这个索解机制的核心操作，合法化为“忠实再现心灵真实状态所必需付出的代价”，从而使得空腔不是被当作书写失败，而是被当作忠实的代价。没有这一重赋魅，早期批评家对乔伊斯的最初回应——“晦涩”“杂乱”“不可读”——就可能在学院内部占据上风，从而阻断索解循环的启动。哲学赋魅，在最关键的时刻，保护了空腔不被当作缺陷而被抛弃。

第二个条件是进化论叙事与文学史书写的内在需求。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史编纂，急于为“现代主义”寻找一条清晰的历史定位。当时的文学史家——无论是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摹仿论》（1946）中

对“现代意识流技巧”的历史定位，还是早期的形式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构建一条“文学如何越来越深入人的内心世界”的进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是“前阶段”——它写外部世界，写社会关系，写衣服、家具和阶级礼仪。现代主义是“正章”——它不再满足于外面，它要走进心灵。意识流文学，作为这一“向内转”的最彻底、最极端的表达，被自然地推到了这条进化链的最末端。这不是一批作品在一个平面上与另一批作品竞争，而是一个新兴的文学范式被铭刻为历史必然性的终点。

这种进化叙事为索解文本的运转提供了第二个齿轮：它把“索取并填充空腔”这个高度费力的行为，从一种“读者个人的趣味选择”，提升为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必要学习”。读不懂《尤利西斯》，不再是“你没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风格”，而是“你没有跟上小说艺术的历史脚步”。这份历史自明性，让索解论述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个稳稳的高等级台阶：它不是人们可以选择读或不读的众多流派之一；它是那个站在了所有流派之上、覆盖所有流派的那个。一个文学学生可以不读超现实主义，但一个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专业的博士生，不可能不读《尤利西斯》。这种必修性，是论述产业得以持续吸引人才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三个条件是难度伦理与学院制度的相互咬合。这是最晚形成、但最持久驱动的条件。二十世纪大学英语系的扩张——尤其是在二战后的美国——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阶层：文学教授。这个阶层的专业合法性，无法建立在“讲授人人能读懂的小说”之上——如果学生自己翻开《远大前程》就能读懂，那他为什么要来听你讲课？职业的壁垒，要求讲台的对面有一堵需要被“阐释”才能穿过的墙。意识流文学就是那堵最完美的墙。它的墙足够硬——乔伊斯的十七年锻造的句法确保它不会被轻易戳破；它的花样足够多——《尤利西斯》的十八章有十八个不同的声音系统，每一个都值得开一门课；它的解释空间足够大——它的空腔性质确保了每一次阐释都无法最终“穷尽”它，永远有新论文可写。

学院制度与意识流文学之间，不是“有一个好作品，学院去研究它”的单向关系。学院需要它这样的作品，来维持自身的专业合法性；它需要学院来持续生产填充空腔的论述，来维持自身的崇高地位。这个相互需求的关系一旦建立，就变成了一个自我维持、自我扩大的装置：学院招收更多学生，开设更多课程，培养更多乔伊斯研究者；更多研究者写出更多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是索解文本的一次新的填充；填充越多，下一批读者越知道“这一部书值得读”；读的人越多，下一代学生成长为新一代研究者。正是在这个点上，索解文本的“硬空腔”特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乔伊斯的文本空腔是“软”的——它的所谓深度一旦被仔细查验就蒸发——那么这个循环在一两代学者之后就会衰竭，因为学者们最终会发现他们不是在被文本诱发，而是在自说自话。但乔伊斯的空腔是硬的——每一代重新去查验的学者，都能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发现一些前人因为自身理论工具的局限而未能看到的新细节。这些新细节不是幻觉——它们是乔伊斯十七年一句一句写进去的，是有文本证据可以拿出来给同行检验的。所以这个循环不会衰竭。它会越来越壮大，因为论述的库存越多，后来者能找到新东西的初始工具就越精密；工具越精密，就越能看到更细微的细节。这是一种良性的螺旋式上升——文本本身的硬壁结构，是保证这个螺旋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崩塌的底座。

这三个条件——哲学赋魅、进化论叙事、学院制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空间中完成了耦合。哲学赋魅保护了空腔不被当作缺陷；进化论叙事保证了填充空腔的行为被提升为一种文学史的必修课；学院制度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与符号资本去实际执行这种填充，并在执行过程中，因为文本本身的硬空腔结构而持续地得到实证性回报，从而形成了一个永动的正反馈循环。意识流文学成为

索解文本的最成功案例，不是因为它“碰巧”很难又“碰巧”被学院选中——而是因为它的诞生时刻、它的文本构造、它所在的知识场域，在这三个条件的耦合下，精确地匹配了索解文本运转所需要的全部齿轮。

八、证伪条件、边界与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某种文学如何成为文学的新判断。一个新判断必须以可以被推翻的方式立住，才算对自己诚实。

以下事实如果在未来出现，将证伪本文关于“索解文本”的核心论证。

第一，如果在一次严格控制的研究中，让一组从未接触过意识流文学相关论述的、具有良好阅读能力的普通读者独立阅读《尤利西斯》的核心段落——例如第三章斯蒂芬的海滩独白或第六章的葬礼段落——然后要求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所读到的内容。如果他们中有显著多数——超过三分之二——能够自发地、不需要任何外部论述的中介，而描述出目前批评传统中所宣称的那些核心美学效果，例如“我感觉到意识的真实流动”“时间的层次被真切地呈现了”“跳跃的联想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模仿了记忆的运作方式”，那么本文的判断就错了。《尤利西斯》的文本自身具有本文所不承认的直接的、跨阶层的可进入性——它不需要论述来完成自身的本体，它的空腔不是结构性的，而只是“太新了，当时的人还没习惯”。一旦习惯形成，论述就不再是完成本体所必需的另一半，而只是历史上曾经充当过的临时拐杖。

第二，如果有一项研究能够证明，那些被本文分析为“索取”的文本特征——指称标签的缺失、时间切口过渡信号的取消、叙述者身份信息的悬置——在乔伊斯和伍尔夫的同时代读者中，并没有引发广泛的、跨阶层的阅读迷失，而是被大部分同时代读者轻松接住，只是因为后世读者的阅读习惯被影视媒介改变了才显得难读，那么本文的判断同样需要被修正。如果是那样，意识流文本的“难懂”就不是它结构性的一部分，而是后世媒介条件变化之后的偶然后果。文本本身不携带索取机制——索取是历史投下的影子，不是文本的骨骼。

反过来，如果在一个控制实验中，两组阅读能力相当、但一组接受过标准阐释导引（听取一段十分钟的关于《尤利西斯》第三章“不可回避的可见世界”对位结构的讲解）、另一组未接受任何导引的读者，在阅读同一段文本之后——第一组显著更可能将文本评价为“有匠心”“有条理”“值得反复读”，而第二组显著更可能将其描述为“混乱”“读不进去”“不知道好在哪里”——并且这种差异不能完全被归因于“第一组被权威观点影响了”（即他们不只是鹦鹉学舌地重复讲解中的话，而是在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时确实体验到了他们所宣称的秩序，他们能够具体地指出文本中哪些地方体现了这种秩序），那么本文的判断就站住了。意识流文学的崇高有实质性的、可测量的份额是由论述填充的那一半，而不是文本自带的那一半。更进一步，如果还能在实验后对第一组读者进行一个“去前见”测试——即要求他们在间隔足够长的时间后，带着这一次阅读的记忆（而非新的外部论述），重新阅读同一段落，并再次描述所经验到的内容——而他们描述中体现出的秩序感显著低于第一次伴随着讲解阅读时体现出的秩序感，那么“论述植入前见构成阅读本体”的判断就获得了更强的实证支持。

本文不声称这一定是一项已经被做完了的实证研究。本文的论证责任，在于给出一个清晰的证伪条件——一个可以被操作化、被未来的经验研究来检验的命题。这是索解文本的判断与它所批评的那个被自我免疫闭环保护着的“伟大”叙事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差别：本文明确说出了在什么情况下本文会错，而后者永远不会说自己什么情况下会错。

最后，关于边界。索解文本这个概念，不是为一切“难懂”的作品都贴上同一个标签。不是说所有需要评论家帮忙的作品，都可以被叫做索解文本。索解文本特指这样一种文学文本：其一，它的难懂不是来自它所处理的内容本身的高门槛，而是来自它对“叙述者-读者”这根最基础的认知导航杆的有意拆除——指称标签的缺失、时间切口过渡的取消、叙述者身份的悬置，使得读者在连“这作品在写什么”都还没搞清楚时就被逐出了文本；其二，这种逐出不是一个可以被训练内化、从而今后可以绕过的初学障碍，而是文本的永久结构——每一代新读者都必须重新被外部的论述接住；其三，这种结构引发的论述回应，不是任意泛滥的，而是被文本内部精密、自觉的句法所持续筛选和诱发的高质量论述；其四，正是在这个循环中，论述通过持续地植入新的前见，改变了文本在后续阅读中所呈现的本体样貌——在没有论述植入前见的情况下，文本在读者的经验中不是一个“难懂但仍完整的作品”，而是一个从未被作为完整文学对象经验过的半成品。

这个边界，把“索解文本”与三种容易被混淆的对象区分开来。一是与一般的“深奥作品”（如哲学著作、某些多义性诗歌）区分：后者的难懂在语义或概念层，不在认知导航层，合格的读者可以通过训练独立进入，不需要终生依赖外部论述来完成文本的本体。二是与“被学术界过度炒作的作品”区分：后者的论述循环之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因为制度运作和符号资本的再生产，其文本本身可能是一个软空腔——一旦被零距离细读的压力持续撞击，它的所谓深度就会蒸发；而索解文本的论述循环之所以能够跨越世纪不衰，是因为文本本身的硬空腔结构能够持续地提供可以被独立验证的、新的文本证据。三是与“在历史中被重新发现的作品”区分：后者的“难懂”是时间距离和文化隔阂造成的，一旦这些外部障碍被学术工作清除，文本恢复了它的可读性，阐释的使命就完成了；而索解文本的论述永远不会“完成”它的使命，因为文本内部的结构空腔不会因为任何学术工作而消失——它永远张开着，永远索取着下一轮论述。

索解文本的命名，无意贬低这项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话语工程。恰恰相反，它可能是对这项工程真正的成就的第一次正名。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把这项成就错误地归给了乔伊斯的句法、伍尔夫的节奏、福克纳的结构——仿佛那是一个已经被固定在纸页上的东西，只等着被阅读去发现。但乔伊斯真正的创造物，不是一个可以被锁在纸页上的东西。他创造了一个在时间中持续地生成自身、持续地要求新的解读、持续地把解读吸进自身本体里的动态结构。他写的不是一本小说。他缔造了一台话语发生装置。伍尔夫、福克纳、普鲁斯特，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用不同的空腔形状、不同的索取策略——缔造了类似的东西。

这是一个反身性的判断，本文必须以诚实收尾。如果“索解文本”这个概念本身经得起未来的检验，那么本文——作为对意识流文学的一种阐释——本身也可能正在参与索解文本的共生循环：本文是那个空腔所索取的无数论述中的最新一篇。这并不构成对本文判断的自反性反驳。恰恰相反，本文从一开始就声明，意识流文学的本体就活在文本-论述的共生之中——本文不是在“揭示一个被掩盖的真理”，本文是在加入一场已经运转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话语共生。如果本文的判断是对的，那么在它发表之后，关于《尤利西斯》的下一批论述，将不得不在索解文本的框架下重新定位自己——不是重复本文，而是在本文与乔伊斯文本之间那个永远不会闭合的裂缝中，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新的空腔。

那个裂缝，才是本文最后的诚实所在：它承认自己也是可以被超越的，因为真正的索解文本——乔伊斯的那台装置——永远会敞开一个比任何一篇关于它的论文都更大的索取空间。

收束全文。意识流文学的伟大，不是被高估了——是被误认了。被误认为是一种“写出来”的伟大，而它真正的成就是“让写出永不完结”。这不是贬低：一项能够让最好的头脑在将近一个世纪里持续地为它工作的索解结构，是这个写满了书的世纪里，为数不多的、真正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一种此前文学模式的、新的文学本体。它的名字，叫作索解文本。

证伪条件

如果未来的实证研究能够证实，意识流核心文本在没有阐释中介的条件下，可以被大多数普通读者自发地、可靠地识别并描述出当前批评传统所宣称的那些独特美学效果——即阐释只是加速、而非合成了体验——那么，索解文本的判断将被推翻，意识流文学的崇高将被重新判定为文本自带的、非共生的品质。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三位最可能吞掉本文核心概念的对手

一个新命名是否必要，不看它读起来多新，而看把它压到极限之后，是否还有某个已有概念能把它一比一地还原掉。本节主动请出最有可能做到这件事的三位对手，并为每一位给出一条**可裁决的分离线**——一个照做就能判出谁对的观测。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先做一次站内分工

本文与作者站内其余处理意识流的文章分工如下：《工序的不可代偿性》《沉默的篡位》《不可代理的残余》《无薪的劳作》《裂缝与在场》《寓体意识》处理的都是**发生本身**——谁必须亲自跑、媒介抢走了什么、语言交不出什么、文本给不给担保、写作者做了什么、读者让渡了什么。本文处理的是发生之外的另一件事：**围绕这些文本长出来的那套论述，与文本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不追问意识流让读者做了什么，而追问意识流的崇高地位有多少是文本与论述共生的产物。因此本文对上述各篇是**可分离的**：即使那些关于发生的判断全部成立，本文的共生判断仍可独立为真或为假；反之亦然。若读者发现本文的论证必须依赖其中任何一篇的结论才能成立，那正是对这一分工的有效反驳。

对手一：贝克的「艺术界」：价值由协作网络生产

这是本文最强的一位对手，原稿未及。贝克（1982）论证：一件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靠的是评论者、编辑、发行者、教师、收藏者构成的**协作网络**共同把它做成艺术——声誉不是作品的属性，是网络的产物。若成立，「文本生产论述、论述完成文本」就只是艺术界机制在文学上的一次转述，而且贝克的版本更节俭：不需要假设文本内部有一个索取结构，只需要一群人**有职业理由**围着它写字。分离线必须落在**方向从哪儿来**：艺术界解释里，网络围拢哪件作品由外部条件决定（资助、位置、时机、社交），作品本身的结构是被动的；本文主张论述的**方向与形态**由文本的断裂类型规定——不是有人来写，是文本在索取某一类特定的写法。

可裁决分离线。取难懂度相当、而断裂类型不同的两组文本（一组是词汇与句法层的密度型难懂，一组是本文所指的索解型断裂），比较其在同等制度条件下（同时期、同语种、同等课程收录

率)积累的**论述密度与论述类型分布**。艺术界解释预测两组的论述量由制度条件预测、彼此无系统差异;本文预测索解型文本不仅论述量更高,且其论述会向「关于如何阅读它」这一特定类型高度集中,而密度型难懂文本的论述向「它说了什么」集中。若两组的论述类型分布无差异,索取结构不存在,本文应并入艺术界。

对手二:吉洛里的经典形成与教学机制

吉洛里(1993)把经典问题从「谁配进名单」改写为「哪些文本进入了教学大纲的再生产回路」:经典地位是学校课程与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产物,而非作品品质的自然结果。这套解释对本文构成直接威胁,因为意识流的崇高地位恰恰高度依赖学院——它是最典型的「课堂文本」。若吉洛里对,本文所说的共生不过是教学制度自身的循环。分离线在**文本结构是否还有增量解释力**:吉洛里的机制完全在制度侧运作,文本被选中之后,其内部结构不再解释任何东西;本文主张在控制制度变量之后,索解结构仍能预测论述的密度与形态。

可裁决分离线。做增量回归:以课程收录率、教材版次、学位论文导师分布等构成制度变量组,以断裂密度与断裂类型构成文本变量组,同时预测论述产出。吉洛里式解释预测制度变量吃掉绝大部分方差、文本变量的增量不显著;本文预测文本变量在控制制度之后仍有显著增量。若增量不显著,本文的核心判断即被证伪——索解不过是教学制度的回声。

对手三:费什的阐释共同体

这是最难缠的一位。费什(1980)的极端主张是:文本没有独立于解释策略的属性,是共同体的策略先造出了它所「发现」的那些特征。按这个说法,所谓索解结构本身就是意识流批评共同体读出来的,本文等于在用共同体的产物去解释共同体的行为,循环论证。分离线必须落在**跨共同体的稳定性**:费什预测解释策略换了,文本特征就换了,因此不同语言、不同学派、不同年代的批评共同体对同一文本会各自读出不同的「难点」,其分布由共同体规定;本文主张断裂位置是文本的物质事实,因此跨共同体的**难点定位**应当高度重合,即使各家对难点的解释南辕北辙。

可裁决分离线。取同一批文本在不同语种、不同批评学派、不同年代的评注中被标记为「此处费解」的**位置**,做重合度分析,并把「难点定位」与「难点解释」分开编码。费什预测两者都随共同体变动;本文预测定位高度重合而解释高度分歧。若定位的跨共同体重合度不高于随机水平,则索解结构是共同体的投影,本文的立论坍塌。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三条可以被判错的预测

下列预测的价值不在它们看起来对,而在它们**能被判错**。每一条都指定了观测对象、比较组与失败条件;若任何一条被稳定地反向观测到,本文的核心论断即应被修正或放弃。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预测一：论述密度由断裂类型预测，而非由难度总量预测

本文预测：以断裂类型（认知连接被撤除的种类）构造的指标，比以难度总量（词频、句长、生僻典故密度）构造的指标更能预测一个文本积累的二级论述量，且在控制作者声誉与制度收录后仍成立。若难度总量的预测力更强或相当，则索解机制不成立，「难懂」就只是难懂。

预测二：论述回写可在版本史中被观测

本文的第二个机制是论述回写文本。预测：一个索解文本在被大量论述之后，其后续版本的副文本（注释、导读、章节标题、编者说明）会系统性地吧论述的结论固化回文本内部，且这种回写的密度显著高于同期非索解文本。若版本史中观测不到回写的密度差，则共生只有单向的一半，本文的「共生体」判断需要削减为「文本诱发论述」。

预测三：去掉断裂会同时降低论述与崇高

本文预测：对索解文本做保内容的连接补齐改写（补回被撤除的认知连接），其可读性上升，而读者对该文本的文学地位评价下降——崇高与索解结构是绑在一起的。若改写后地位评价不变或上升，则崇高与索解无关，本文对二者共生的判断被推翻。

注释

-
- [1] 本文中对读者阅读反应的描述，如“大多数翻开《尤利西斯》的读者在几十页内放弃”“读完《达洛维夫人》的读者承认‘知道它很好，但说不上来好在哪里’”等，均系基于文学批评史中的普遍记载和作者个人阅读经验所做的典型化概括，并非来自严格受控的实证研究数据。这些描述旨在例示索解文本所造成的结构性效应，而非提供可量化的经验证据。关于《尤利西斯》早期接受过程中读者反应的史料，可参阅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在《詹姆斯·乔伊斯》（1959/1982）传记中收集的当时报刊评论，以及Deming（1970）所编的两卷本《詹姆斯·乔伊斯：批评遗产》中收录的同时代读者和评论家的反应记录。
- [2] 斯图尔特·吉尔伯特（Gilbert, 1930）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书是在乔伊斯密切监督和亲自口授下完成的。乔伊斯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他“给了吉尔伯特所有线索”，以确保这部解读手册能够准确地为读者提供进入《尤利西斯》的通道。参见艾尔曼的乔伊斯传记中关于吉尔伯特合作部分的详细叙述。乔伊斯在1920年代致友人的书信中反复强调他在《尤利西斯》中“放进了足够多的谜语和迷宫，让教授们忙上几个世纪”——这句话出自乔伊斯致雅克·伯努瓦·梅尚（Jacques Benoist-Méchin）的书信，被艾尔曼在传记中引用，已成为乔伊斯研究史上的名句。这一事实为理解《尤利西斯》作为索解文本的自反性操作提供了极重要的旁证：作者本人不仅主动参与了论述的另一半的生产，而且精确地预估了这个共生循环的持续时间和运作方式。
- [3] 本文所论述的“空腔”主要在认知导航层面运作，与伊瑟尔（Iser, 1978）在《阅读行为》中详细分析的审美层面上由“未定点”和“否定”所构成的“空白”有本质区别。本文并不否认伊瑟尔的空白理论对于一般文学阐释活动的效力，而是指出它无法涵盖意识流文学所制造的那种在阅读活动尚未真正展开之前就使之陷于停滞的认知断裂。关于这一区别的更详尽讨论，可见本文第三节。
- [4] 本文对布迪厄（Bourdieu, 1992）经典建构理论的讨论，集中在其“误识”概念对“作品内在品质”与“制度建构”二元对立的消解方案上。布迪厄的原著对社会空间、惯习和场域的分析远比此处概括的要复杂，本文的引述仅限于与意识流文学经典化问题直接相关的部分，并非对布迪厄理论的全面评估。另外，本文对布迪厄的批评并不意在完全否定制度分析的有效性，而是指出其框架在解释意识流文学这一特殊现象时，无法充分说明文本结构的不可还原性，即论述循环之所以能跨世纪继续，必须有文本内部的硬空腔结构作为底座。
- [5] 费什（Fish, 1980）在《这门课里有没有文本？》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阐释社群”概念。本文在此仅取其与索解文本构成对照的那个维度，即意义是由社群共享的解释策略所生产这一判断。费什的理论实际上更强调阐释策略

的先在性和自足性，而本文则试图论证：在意识流文学的案例中，是文本的特殊结构征召并训练了阐释社群，而非相反。因此，本文的判断与费什的理论构成一种因果方向上的反转，而非完全拒斥。

- [6] 本文对马拉美诗歌的讨论仅限于其句法和语义层面所造成的晦涩类型，并不涉及围绕马拉美作品的丰富哲学阐释传统（如布朗肖、德里达等人的工作）。本文的判断是：马拉美诗歌的晦涩主要发生在语义深度层面，其基本认知导航（读者知道自己在读一首诗、知道一个主体正在言说）并未被拆除；因而，它不具备索解文本所必需的那种强制性认知空腔。这一判断可能需要更详实的文本分析来支撑，但在本文的论证框架内，马拉美仅作为一个核心对照案例出现。
- [7] 本文对电影媒介特性的讨论主要在麦茨（Metz, 1968）的电影符号学框架下展开，即电影是“呈现”系统而非“陈述”系统。关于意识流电影作为失败共生实验的判断，系本文基于这一媒介理论框架所做的推演，更全面的考察尚需结合具体的电影文本分析和认知电影理论的最新成果。此处的论述旨在为“索解文本”概念提供一个对比性的边界，而非对意识流电影的独立研究。
- [8] 本节所述的控制实验构想，借鉴了实验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中的假设性检验逻辑，同时也呼应了伽达默尔阐释学传统中对“前见”在理解活动中角色的理论论证。本文不声称该实验已经在任何地方被实际实施过；它仅是作者为了使论文的核心命题具有可证伪性而提出的一套思想实验性质的检验方案。这一部分属于论证的方法论自省，而非经验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 Auerbach, Erich. 1946. *Mimesis: Dargestellte 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ändischen Literatur*. Bern: Francke.
- Barthes, R. (1968). *La mort de l'auteur*. Manteia, 5, 12–17.
- Becker, H. S. (1982). *Art Worl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gson, Henri. 1889.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Paris: Félix Alcan. (英译本 *Time and Free Will*, trans. F. L. Pogs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0)
- Bloom, H. (1994).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Harcourt Brace.
- Bourdieu, P. (1992).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Éditions du Seuil.
- Bourdieu, Pierre. 1992. *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Paris: Seuil. (英译本 *The Rules of Art*,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ming, Robert H., ed. 1970.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Eco, U. (1962). *Opera aperta*. Bompiani.
- Ellmann, Richard. 1982. *James Joyce*.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初版 1959)
- English, J. F. (2005).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aulkner, William. 1929.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Jonathan Cape and Harrison Smith.
-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 Stanley.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damer, Hans-Georg. 1960.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J. C. B. Mohr. (英译本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Sheed & Ward, 1975)
- Gilbert, Stuart. 1930. *James Joyce's 'Ulysses': A Study*. London: Faber & Faber.
- Guillory, J. (1993).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ser, Wolfgang. 1976. *Der Akt des Lesens: Theorie ästhetischer Wirkung*. München: Wilhelm Fink. (英译本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James, William.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s. New York: Henry Holt.
- Joyce, James. 1922. *Ulysses*. Paris: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 Kenner, H. (1978). *Joyce's Voi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nner, Hugh. 1978. *Joyce's Voi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llarmé, Stéphane. 1897. 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 In *Cosmopolis*, May 1897.
- Merton, R. K. (1968).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 159(3810), 56–63.
- Metz, Christian. 1968. *Essais sur la signification au cinéma*. Paris: Klincksieck. (英译本 *Film Language: 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 trans. Michael Tayl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roust, Marcel. 1913–1927.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Paris: Grasset (vol. 1) / Gallimard (vols. 2–7).
- Woolf, Virginia. 1925. "Modern Fiction." In *The Common Reader*. London: Hogarth Press.
- Woolf, Virginia. 1925. *Mrs Dalloway*. London: Hogarth Press.
- Woolf, Virginia. 1927. *To the Lighthouse*. London: Hogarth Press.
- Woolf, Virginia. 1977–1984.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5 vols. Ed. Anne Olivier Bell. London: Hogarth Press. (涵盖 1915–1941 年间的日记, 本文引用的关于《达洛维夫人》创作过程的日记条目见第二卷)
- de Man, P. (1979). *Allegories of Read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 Man, Paul. 1979.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